

医与士之间：明末清初上海李延昱的边缘人生

冯玉荣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武汉430079)

【摘要】上海人李延昱的身份比较复杂，受文坛推重的诗人、擅长抚琴的琴人、社团中的翘楚、城市山林里的隐士、行医者等等，这些身份从不同领域说明其社会角色和获得名声的途径。实际上他生前并不显赫，在提及时，均托他人之名，徐孚远的高足、名医李中梓的侄子。而他本人则在临终时以一瓢一笠一琴一砚生平玩好分给友人，并将所藏书两千卷赠给著名学者朱彝尊，借此完成士者身份的回归。经历明清易代的士人，在复明无望之后，无法通过直接参与新政权实现社会理想，不得已以医谋生，但又不甘心以此作为人生的归宿。士人运用一系列文化符号象征，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寄托于超越个体生命的传统文化表征中，以作为人们回顾这段改朝换代的历史记忆。这种无论是出于本人自身的选择，还是叙述者有意造成的模糊，实际上反映出易代时士人的一种困惑，以及泛边缘化的心态，同时又想回归主流的愿望。

【关键词】明末清初 李延昱 医士

“生长士族，人不知其门阀；策名仕版，人不知其官资；博综图籍，人不知其储藏；洁治酒肴，人不知其庖爨。”清初著名学者，曾经被荐举为博学鸿儒的朱彝尊，参与过明史修撰，同样是江南人，却为李延昱写下这段极为“吊诡”的传记。“生于士族”、“策名仕版”，其身份本应人人知晓，而却未人知晓。“诵其诗，知为徐孝廉暗公之弟子，然其出处本末，终莫得而详也。”^①在朱彝尊的描述下，他的身份显得如此扑朔迷离。正史清史稿里皆没有他的传记，地方史志中也没有占据一个很显眼的地位。这样看来，李延昱实在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物，以至于各种记载都相当模糊。

学界对李延昱关注较少，仅有的研究多限于医学史的领域，把他视为清初医家。^②也有说他是擅长抚琴的琴人、^③道士。^④然

作者简介：冯玉荣，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近世知识群体的专业化与社会变迁”（项目批准号：12JJD770018）、华中师范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自主科研项目“以医起家，以儒经世：明清儒医群体与地方社会”（项目批准号：120002040685）的阶段性成果。

①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23，清嘉庆二十四年扶荔山房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698册。关于李延昱的生平小传，朱彝尊曾在《明诗综》（卷88，《四库全书》第1460册）中也提及，并收录了李延昱诗十九首。内容近乎相似，表达对李君未能显于当世的不平。此外，朱彝尊撰《高士李君塔铭》，收录在嘉庆《松江府志》（卷79《名迹志·附外郡冢墓·高士李延昱墓》，嘉庆二十二年明伦堂刻本），李延昱撰、沈颂清辑的《放鹞亭稿》（国家图书馆藏清稿本）也收录了该塔铭。

② 何时希：《中国历代医家传录》，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第344页。陈蕃：《名医李延昱轶事》，《山西中药》1986年第2卷第6期。汪剑、和中浚：《明末清初医家李延昱及〈脉诀汇辨〉考》，《中医药文化》2012年第3期。

③ 今人许健编著的《琴史初编》中称李延昱长于弹奏《霹雳引》，得自韩石耕（韩崑1615～1667）的传授。许健：《琴史初编》，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第131～132页。

而翻阅清人的文集，却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后世的文人没有关注他作为医者的形象，反而对他临终时的举动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尽管李延昱生活的年代，“弃儒业医”为士人中较为常见的现象，大批知识分子由儒入医，改善了医生的文化素质和知识结构，改变了医者“多是庸俗不通文理之人”的状况，使医生的社会地位相应提高。医学已不再是纯粹的“方技”，而成为“行仁”、实现儒家理想的重要手段，使得医生成为一部分士人退而求其次的一种主要的职业选择。^①但是对于“道”与“艺”之争还是存在，尚医士人的境地还比较尴尬。^②正是对临终之举的关注使得李延昱看似模糊的人生，在以后长达数世纪里始终被传颂。那么这是得力于朱彝尊故弄玄虚的描述，还是李延昱身前刻意的安排，使得看似平凡的他得以跻身于文人的世界。

明清易代，波谲云诡之下，士人地位迭落，尤其是那些不愿与新政权合作，被排除于新政权之外的士人，如何保持操守？如何经世履道？他们是否因为被边缘化，而完全在历史上没有声音？本文利用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放鹞亭稿》^③及相关著作，重新解读李延昱，避免概念化建构历史的偏颇，以补充大历史的视野所不及。

一、藏书与赠书：文人朱彝尊的描述

朱彝尊(1629 ~ 1709)，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人。曾祖朱国祚官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彝尊少时即以诗古文辞见知于江左之耆儒遗老，读书过目成诵，博通经史，擅长诗词，又精于金石考证之学。以布衣召选博学鸿儒，官翰林院检讨。“当时王士禛工诗，汪琬工文，毛奇龄工考据，独彝尊兼有众长”，藏书甚富，著有《经义考》、《日下旧闻考》、《曝书亭集》。^④《曝书亭著录序》中叙述了其藏书的过程：“束修之入，悉以买书。及通籍，借抄于史馆者有之，借抄于宛平孙氏、无锡秦氏、昆山徐氏、晋江黄氏、钱塘龚氏者有之。主乡试而南还，里门合计先后所得约三万卷，先人之手泽或有存焉者。归田之后，续收四万余卷。又上海李君赠二千五百卷，于是拥书八万卷。”^⑤

李君的赠书成为朱彝尊藏书的一个重要来源，李君即李延昱(1628 ~ 1697)。^⑥不过李延昱究竟为何许人也？按朱彝尊的描述，李氏世居松江府上海县，祖父李尚袞、父李中立，皆举进士。李尚袞未授官，李中立为大理寺右评事。先祖因参与抗倭，立有战功，曾建祠南汇城以祭祀之。^⑦叔李中梓，字士材，号念菽，博学精医，性聪慧，精轩岐，博究群书，名著江左，负笈甚众，著有《医宗必读》、《颐生微论》、《士材三书》、《伤寒撮要》、《内经知要》等。^⑧因此，李延昱出身当算世家，但是世人为什么不知道他的门阀呢？据朱彝尊讲，“君娶伍氏、再娶殷氏、鞠氏，先后生子九人，悉夭。而群从皆学官弟子，与君游者，或不知其家室子姓”。^⑨李延昱虽然娶有继室，但子嗣夭折，与其游学者均不知他家世，故而没有人知他曾出身“士族”。

晚明时松江文化昌盛，由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彭宾、杜麟征、周立勋等人创立的文社“几社”，推动了云间派诗词的兴盛。^⑩松江几社与江南东林、复社等联系颇为紧密，李延昱当时尚年幼，拜于几社元老徐孚远门下。年十七遭遇鼎革之变，乃追随徐孚远参与抗清活动，甫二十兼道走桂林，任唐王某官。^⑪南明政权覆亡后，鉴于其敏感的身份，他并未回松江，而是

^④ 曹聚仁称“道士李延昱”，同时也指出李延昱实有不得已的苦衷。曹聚仁：《上海春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2 ~ 73页。

^① ②关于士人“弃儒业医”，学术界已有较详尽的研究，陈元朋：《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兼论其在金元的流变》，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7年；邱仲麟：《儒医、世医与庸医》，编入《明人文集与明代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00年4月）；王文景：《明代的儒医》，（台湾）《通识教育年刊》第4期，2002年11月；祝平一：《宋、明之际的医史与“儒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7本第3分册，2006年；Chao Yuan-ling,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Study of Physicians in Suzhou, 1600 - 1850* (New York: Peter Lang, 2009)；王敏：《清代松江“医、士交游”与儒医社交圈之形成》，《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等等。

^② “良医良相”说本身，不仅无助于作为职业的医生的地位的独立和提升，反而强化了人们将其视为儒的附庸的意识。余新忠：

隐居浙江平湖一带，寄居道观佑圣宫，以行医自给，并改名易字。故他在南明为官的经历也无人知晓。值得注意的是，朱彝尊在描述他行医生涯时，特别强调他为医有德行，“有延之治疾者，数百里必往，视疾愈不责报”。虽然行医谋生，但是其报酬均用来买书，“或酬以金，辄从西吴书估舟中买书。不论美好，由是积书三十椽，绕卧榻折旋皆书也。与君游者，相对楼下，不知其储书之富”。^① 展现了李延昆与时医不同的道德操守和生活品位，以“士君子”的身份行医履道，保持了士人的操守。

在朱彝尊笔下，李延昆行医之外，还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调的人，喜美食、喜精致的生活，“客过，无分出处贵贱，怡颜相接。暇则坐轻舟载花郭外，艺庭前饮，客酒必自远致，山肴海错饌必丰。与君游者，不知庖爨何地。而君意所向，何者为疏密也”。^②这种精致绮丽的生活实是晚明文人精神的延续。晚明大才子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宣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③缺了这一环，文人将不称其为文人。而对于当地的文人士大夫来说，也比较乐意与之交往。在一个医疗资源不甚理想的环境中，士人“好与医游”，以获得医疗上的便利，这当然是比较现实的考虑。^④李延昆曾作《九峰作》：“薛山笋价不论钱，两畜充名暗棹船。庖事谁能辨真伪，错教馋口漫流涎。”^⑤故朱彝尊称他“被道士服，栖琳观之侧。泛泛松舟，而泝而游，疾者熏灌，或以解散。有花有苗，有甲有条，步檐兮逍遥；有经有子，有文有史，摇笔兮伸纸；有肴有脍，有藪有鱼，留客兮康娱”。^⑥通过他的笔触再现了晚明士人的生活情趣，复原了遗民的生活情境。

朱彝尊也曾为其师徐孚远立传，“徐孚远，字暗公，松江华亭人，崇祯壬午举人。先生达斋侍郎之裔，太师文贞公族孙。与卧子、彝仲、勒卣辈六人倡几社于云间，切劘古今文词，倾动海内。既而乘桴远引，骑鹤重归。矢诗不多，类有身世之感。《晓入京口》云，‘猎猎风稍劲，惊流伏枕闻。晨钟下岩际，戍鼓列江滨。已辨南城树，新添北府军。乱离知未定，淹泊对孤

《“良医良相”说源流考论——兼论宋至清医生的社会地位》，《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③李延昆：《放鹞亭稿》，国家图书馆藏清稿本，为沈颂清所辑。此书载有李延昆各种生平小传及序跋，书仅上下卷，汇集李延昆部分诗作。目前仅国家图书馆存一孤本，较少为学者利用。

④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12，清乾隆二十五年教忠堂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58册。《清史稿》卷484《文苑一朱彝尊传》。

⑤朱彝尊：《曝书亭集》卷35《曝书亭著录序》，《四库全书》第1318册。

⑥据钱椒考证，李延昆于崇祯元年戊辰生，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卒。钱椒：《补疑年录》卷4，清道光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517册。

⑦朱彝尊：《高士李君塔铭》，收录在嘉庆《松江府志》卷79《名迹志附外郡冢墓高士李延昆墓》，嘉庆二十二年明伦堂刻本。沈颂清所辑，李延昆所撰《放鹞亭稿》（国家图书馆藏清稿本），也收录了该塔铭。关于李延昆生平事迹，又载民国《南汇县志》卷13《李延昆传》，成文出版社影民国十六年重印本；《沪城备考》卷2《补遗李延昆》，“上海掌故丛书”第一集。

⑧王宏翰：《古今医史》续增本朝，清抄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030册。

⑨朱彝尊：《高士李君塔铭》。

⑩杜登春：《社事始末》，载《东林始末》，丛书集成初编本第764册。

⑪《李高士诗并序》，《船山学报》癸酉第二册，1933年第2期，第32页。

云。’”^③此传记对徐孚远一生有完整的写照，出生世族，为几社元老，文词甚佳。大概一生为士，无甚模糊，故直笔描述，唯参与南明抗清一事稍加隐晦。朱彝尊本人也出身世家，父辈咸有文名，浙西文人常雅集于朱家。受父辈耳濡目染，朱彝尊也曾参与顺治七年(1650)在嘉兴南湖举行的“十郡大社”，时太仓吴伟业、长洲宋德宜、吴县尤侗、华亭徐致远、吴江计东、昆山徐乾学等皆来赴会，彝尊与之，“越三日，乃定交去”。^④在长期的交友与游历中，朱彝尊累积了相当丰富的社交资源。康熙元年(1662)爆发通海案，朱彝尊避祸于浙江永嘉，奔走于山西、河北、山东一带。对于李延昱这样经历易代，隐医自给，由松江游历至吴地平湖的泛游生活，朱彝尊应该是更能理解的。

李延昱随其叔李中梓从医多年，并且著有大量的医书，朱彝尊并没有用过多的笔触去谈，而是落脚在行医所得的馈赠与藏书。可见，这位诗文大家已充分肯定了李延昱的士君子的身份，而不单纯以医者目之。正是基于和儒者群体的这样一种摒除直接功利目的的藏书、赠书的举动，使李延昱成功维持了“士”的身份、地位。同时借由朱彝尊的声望与交往网络，使后世的士人们一直关注他、铭记他。

清初诗人查慎行获悉李延昱藏书赠与朱彝尊后，曾作诗云：“叹息诗人失李颀，柘湖回首旧游非。自怜老友今无几，且喜藏书得所归。万卷又增三篋富，千金直化两蚨飞。平生谬托知交在，悔不从渠借一瓶。”^⑤然后斯人已逝，长歌当哭。朱彝尊发出了一种为英雄扼腕、英才埋没的叹息：

慷慨松江别，凄凉桂水还。担花尝郭外，卖药遍人间。野史何由续，遗书尚未删。空余怀旧泪，一洒柘湖湾。^⑥

二、一瓢一笠一琴一砚：李延昱的自我呈现

李延昱生前多次为自己易名，初名彦贞，字我生，一字期叔，后更今名延昱，字辰山。然而他本人“腆其生平事迹不以告人，人亦不能知也”。临终时，也似乎异于常人，做了刻意的安排，“平居玩好，一瓢一笠一琴一砚，悉分赠友朋。越二日终，遗命弟子用浮屠法，盛尸于龕，焚其骨，瘞之塔。”^⑦此种安排，究竟想呈现什么？

在时人眼里，他首先是一名医者。他晚年在平湖行医，并撰有大量的医学著作，《药品化义》、《医学口诀》、《脉诀汇辨》、《痘疹全书》等。^⑧但是他本人认为自己是托于医，在《脉诀汇辨》序言中称，“余浪游者三十年，托刀圭以糊口”，^⑨并且弟子中罕有以医闻名的。《脉诀汇辨》共十卷，其中前八卷以及第十卷为他自己编写，第九卷辑其叔叔李中梓的医案。他的医学著作，基本上是对其叔的继承与发展。李中梓从医多年，“屡疗危症，皆奏奇效”，^⑩从为医的角度来说，李延昱虽承家

³ ①②⑥ 朱彝尊：《高士李君塔铭》。

③张岱：《自为墓志铭》，载《张宗子小品》，魏崇武选注，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第242页。

④陈元朋：《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兼论其在金元的流变》，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7年，第206～219页。

⑤李延昱：《九峰作》，载李延昱：《放鹞亭稿》，国家图书馆藏清稿本。

⑦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19。

⑧杨谦：《朱竹垞先生年谱》，顺治七年22岁条，清刻曝书亭集诗注本。

⑨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23，《得树楼集》（起丁丑正月尽十二月），《闻李辰山藏书多归竹垞》，《四库全书》第1236册。

学，但无论从医术，还是著述，都无法超越李中梓。李中梓的《医宗必读》开篇为《读内经论》^⑥，强调医学经典的重要性。李延昱的《脉诀汇辨》首篇为《多读书论》，以多读书来警醒后人。叔侄两人旨趣大为不同，可能李中梓是希望构建儒医的形象，而李延昱本人则是希图以士的身份来终结。故李延昱则处处强调读书，并认为自己是浪游天下，不得已三十年托名其中。

除此之外，他的诗作文集里很少涉及自己行医的经历，医与士更像是两个世界的人。他的诗歌则展现了他的另一面，他一直流亡海上，后定居平湖，但一生萦绕于心的，仍是绵绵不断的乡情。“万里朝宗水，喧豧沪垒东。稽天新涨碧，浴日晓云红。地控三吴尽，潮分两浙通。春申遗庙在，社鼓赛村翁。”^⑦复明已无望，自己曾经追随多年的老师也仙逝，“闻说乌伤界，前期似梦中。四围青嶂合，一道白云通。栖隐终难遂，飘零转易穷（原注：先生没于潮州）。门生头白尽，无路哭遗踪”^⑧。身为遗民，客居他乡，偶回故土，已是“旁人笑问客何姓，得比遗民不得刘（登天马西径，有人同行，问及予姓，故戏用刘遗民峻极院事答之）”^⑨。诗歌里以遗民自嘲，隐约描述了自己一生不幸的遭遇，有《忆亡儿汉征》一首，悼念亡儿，“自汝云亡后，萧条恨不禁。笑啼犹在眼，出入总经心。书帙凭鱼蠹，琴囊任鼠侵。徒将老年泪，点滴透衣襟”^⑩。一生孤苦，也是常人所未能了解的。河山沦亡，故他以明代遗民自居，所撰《崇祯甲申录》、《南吴旧话录》，足以裨国史之采择。此外还有与彭孙贻合撰的《靖海志》，共四卷，前三卷为彭孙贻撰、后一卷由他补编，^⑪记明末清初之事，实抒亡国之恨，为后世史家之重要参考著作。李延昱对于自己参与南明政权一事少有提及，仅在《放鹞亭集》中有诗讽喻南明政权，其中《贵阳相》直书南明权臣误国：“拥兵乘机谋入觐，拜疏即行白日晚；五事蛊君君窃喜，党刘张胆暗逐史；相门成市君门远，西北浮云半遮面；跋扈元戎按剑瞋，下江复逃楼船军；盘石倾坠马贯草，狼狽唏嘘浙西道；桑榆事业收不得，一朝见傅如鬼臧；福王北去鲁王逃，相公腰领轻鸿毛。”^⑫痛骂南明小朝廷执政之误国，于故国之思，顷刻不忘。

⁴ ①朱彝尊：《曝书亭集》卷19《李高士（延昱）墓下作》。此外，嘉庆《松江府志》卷79《名迹志附外郡冢墓高士李延昱墓》，还附录了于东昶《当湖杂咏》：“混迹医翁道士闲，半生乡井不知还，一抔黄土鸚湖曲，剩与闲人说放鹞。”于东昶，字汤谷，浙江平湖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庚子副榜。

②朱彝尊：《高士李君塔铭》。

③嘉庆《上海县志》卷15《艺术》。

④李延昱：《脉诀汇辨自叙》，著于甲辰（康熙三年，1664）秋日，期叔氏识于湘江之旅行泊庵。《脉诀汇辨》。

⑤乾隆《江南通志》卷170《人物志·艺术》，《四库全书》第511册。

⑥李中梓：《医宗必读》卷1《读内经论》，明崇祯十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022册。

⑦李延昱：《上海》，载朱彝尊：《明诗综》卷88《李延昱》。

⑧李延昱：《遇宣和岭至义乌界追忆先师孝廉徐暗公先生相期卜居处》，载朱彝尊：《明诗综》卷88《李延昱》。

⑨李延昱：《放鹞亭稿》卷下，《九峰作》，国家图书馆藏清稿本。

⑩李延昱：《忆亡儿汉征》，载朱彝尊：《明诗综》卷88《李延昱》。

⑪彭孙贻撰、李延昱补：《靖海志》，清抄本，《续修四库全书》第39册。

⑫李延昱：《放鹞亭稿》卷上《贵阳相》。

李延昱临终时，“及病革，平居玩好，一瓢一笠一琴一砚，悉分赠友朋”。用“一瓢一笠一琴一砚”这几种象征物，完成了他对现实的安排，以实践他对儒者的回归。李延昱数十年奔波，然壮志未酬，隐于平湖，“一瓢一笠”实代表了颠沛流离的生活。鼎革之后，相对晚明的奢华，不过只剩下“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真如隔世”，^①“除却乐书谁殉葬？一琴一砚一《兰亭》”。^②他多才多艺，擅书法，精音乐，自度曲，诗文亦佳，何尝不是一个传统文人的形象。然而复明无望，隐居异乡，行医自给，心灵同样遭受伤害，只有栖身江湖，寄情山水，以高士自诩，以诗酒琴书为伴。“寄此一椽下，日遭群动喧。我自饮吾酒，忽觉日影偏。终身在城市，仍不异云山，清风与明月，有时相往还。昨者事已往，今者又何言。”^③“年年作客不归家，绿遍平芜一望赊。最忆竹堂西畔坐，茶烟吹过紫藤花。”^④“他乡杯酒前朝寺，一曲相看各断肠。”^⑤山河破碎，客居他乡，才华极高，却终身困顿。

故李延昱生前以道士自居，逝世时用佛屠之法安葬，借用一系列具有文化身份象征的安排，使其呈现传统文人儒、释、道三者混一的形象，借此来超越易代，避免权力话语的遮蔽。^⑥晚明江南士人活跃于地方社会，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堪称中流砥柱。并且尝试在科举之外，另外发展出一套自我认同与辨识其社会身份的方式。松江隐士陈继儒，举止潇洒，琴棋书画皆佳，雅致的生活情趣，形成独特的品位，博得大众欢心。^⑦对于地方社会洞如明察，甚至时事政局，都有独特的见解。^⑧以至于“守令下车，台使案部无不造谒其门，咨询地方利弊，一时文人学士咸听其月旦之评，一切食用时出新意，为之转相仿效”。^⑨陈继儒虽然标榜远离科场、权力圈子，实际仍保持广泛的社会交往。尽管隐逸，却仍然继承儒家传统经世理想。士人得以投身于社交场合，借此营造声名，有自我肯定的渠道。明中期以来已有一个“文艺社会”的存在，此文艺社会提供给文人一个可以营求个人声名、确认个人社会价值的取径。^⑩这种身份的认同方式，应是李延昱所希望的，虽为隐士，内心兼济天下。仕与不仕，形迹固不相同，但在价值取向上却呈现大体一致的趋向，即以文化传承作为其人生价值的寄托。这也是满汉易祚的政局下，士人希望凭借内在的精神修养和相对独立的文化传统完成其自身价值。

对于李延昱这一举动，经历另一个易代的清遗老徐珂特地以专题书之，《临死赠物于友》“康熙丁丑十一月，朱竹垞至平湖，访李延昱，而已疾革。视之，犹披衣起坐，出所著《南吴旧话录》、《放鹞亭集》以付朱，且命弟子以藏书二千五百卷畀焉。余若平居之玩好，一瓢一笠一琴一砚，悉分赠友朋。越二日终，遗命弟子用浮屠法，盛尸于龕，焚其骨，瘞之塔”。^⑪这种情愫大概只有亲历易代的人才会感触更为真切。不独明末清初，晚清民国梁济，曾用数年的时间来计划和安排他自己的弃世，希望世人按照他的设计来认识他的自杀。^⑫临终的举动似乎也是刻意安排后人来理解的。

^① 张岱：《自为墓志铭》，载《张宗子小品》，魏崇武选注，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第242页。

^② 苏涧：《冷然斋诗集》卷8《到马厓哭尧章》，《四库全书》第1179册。“南宫垂上鬢星星，毕竟襦衫不肯青。除却乐书谁殉葬，一琴一砚一兰亭”，此诗本是有感于南宋后期的姜夔，一生未曾做官，过着清客游士的生活，才华极高，却终身困顿，直至穷死江湖。

^③ 李延昱：《和陶饮酒诗》，载朱彝尊：《明诗综》卷88《李延昱》。

^④ 李延昱：《最忆》，载朱彝尊：《明诗综》卷88《李延昱》。

^⑤ 李延昱：《大报恩寺别张南邨》，载朱彝尊：《明诗综》卷88《李延昱》。

^⑥ 拙著：《消解易代：从〈同郡五郡咏〉看清初士人身份认同》，《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⑦ 陈继儒：《岩栖幽事》，明万历绣水沈氏宝颜堂秘笈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8册。陈继儒在日常生活中体验花草树木琴棋书画的诗意与禅味，“香令人幽、酒令人远、石令人隽、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闲、杖令人轻、水令人空、雪令人旷、剑令人悲、蒲团令人枯、美人令人怜、僧令人淡、花令人韵、金石彝鼎令人古”。

李延昱临终前的举动，更像一名雅士，而这一举动最终成就了他。后世的文人总为这一雅举所打动而传唱，而他身上曾有的“医”的技艺身份则淡化，留给后人的就是“一瓢一笠一琴一砚”的绝响。

三、家亡国破剩闲身：后世的诠释

李延昱一生漂泊，既习医，又雅好藏书、著书，又冠以道士之号，临终还以佛陀之法归葬于塔。他的这一生该如何定位，如何诠释呢？李延昱既没有取得明朝的功名，也无清朝的功名，更没有所谓彪炳史册的功绩，故清史稿未曾叙录，然而他是否在历史上就无声音了呢？

在地方史志中，李延昱最初是作为医者的形象被记载。乾隆年间修、嘉庆十一年(1806)增订的《南翔镇志》把李延昱归在《艺术》类，说他“精医学，为云间李中梓弟子。与程公来、顾则思交善，三人皆明医者。所著《脉诀汇辨》盛行于世”。^⑧在嘉庆十九年(1814)所撰写的《上海县志》中也将其归在《人物·艺术》，“少学医，中梓撰方书十七部，延昱补撰《药品化义》、《医学口诀》、《脉诀汇辨》、《痘疹全书》四部，刊行之”。然而《上海县志》在描述他“医者”身份之后，又特别采纳了他游走桂林的经历。“又曾走桂林，任唐王某官，事败后遁迹平湖佑圣观，为道士，以医自给，聚书至三十匱。生平事迹不以告人，人亦不能知也。晚与朱检讨彝尊善，举所著及藏书二千五百卷畀焉。康熙辛丑卒。”^⑨较镇志而言，虽然将其视为医者，但补增了他参与南明政权的经历。至嘉庆二十年(1815)《松江府志》载“李延昱，上海人，同郡举人徐孚远为高第弟子，尝从孚远入浙闽后，隐于医”。^⑩在介绍时，是托其师徐孚远之名，并且认为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医者，而是隐于医。

李延昱的身份由一个归为“艺术”类的医者，转而被述为隐于“医”，与此同时，对他参与到南明政权之事不再加以避讳。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后世对李延昱的评价，作为“医”的身份定位逐渐被退去，有别于“技艺”、“艺术”类，承担“道”的士君子的身份开始突显。

对于李延昱而言，不经历易代，在明朝原本是以“士”的身份终老。然而随着满族异族的逐鹿中原，原有的社会身份和价值在现实中逐渐崩解，功名之路窒碍难通，只好转而习医。“医”成了慰藉士子复明无望、救济其自我失落之道。无论如何，医是士人开辟的另一种人生实践的路径。与李延昱同时代的人，以“名医”见著于世者不乏其人。然而，尽管明代儒医人数较前朝增多，士大夫从医者亦有，但士大夫中除王肯堂、王纶两人是以医显名者，其他人则可能多受到隐于医卜观念的影响，不愿以医显名于世，而未能留下记录。^⑪“医”长期以来被视为方技，“文学”被视为“正途”。士人身后评价，以文学显胜于以医显。即使医名显著，如李士材“号为能生死人”，为其作序者仍不免流于惋惜，而上升到“上医医国”的感叹中。^⑫面对“华夏”亡于“夷狄”，傅山曾在朱衣黄冠道士身份及行医的掩护下，进行秘密的反清活动。然而，傅氏抱着亡国遗民的孤臣孽子之恨，溘然仙逝时，临终遗嘱仍以朱衣黄冠入殓，以此来表明志向。^⑬从李延昱的角度来说，他喜好诗文，交游广阔，仍希望以士的身份而成就于后世。作为医者谋生，恐为其身份所埋没。借助他本人的安排及朱彝尊的传诵，极力避免了以单纯的

^⑧人们甚至相信，袁崇焕杀毛文龙，与山人陈继儒的建议有很大的关系。钱龙锡入阁前，向陈继儒请教国是，陈赠一句：“拔一毛而利天下”，钱不解其意。适袁崇焕请斩毛文龙疏至，方大悟曰：“此眉公教我者耶？”遂令崇焕亟斩之（王应奎：《柳南续笔》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9～160页）。

^⑨乾隆《华亭县志》卷14《陈继儒传》。

^⑩王鸿泰：《迷路的诗——明代士人的习诗情缘与人生选择》，（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0期，2005年，第1～54页。

^⑪徐珂：《李延昱临死赠物于友》，《清稗类钞》第6册《义侠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60页。

^⑫罗志田：《对共和体制的失望：梁济之死》，《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

医者而论，而试图保持了其“士君子”的身份。

生于清朝、长于清朝的平湖沈季友(1654 ~1699)，与李延昆有私交。^⑥曾为其作传，“延昆，字期叔，号辰山，上海人。少负逸才，善谈论，熟于旧家典故及诸琐碎事，《云间旧话录》，其诗文曰《放鹞亭稿》。露抄雪纂，晚年黄冠草履，自称道者。二子早丧，遂无嗣。年七十，忽病作，命龕跌坐而逝。”^①只字未提行医之事，而是一名熟旧家典故，善著文之士，称其为“放鹞道者”。康熙年间，桐乡藏书家汪文柏，闻辰山藏书三十椽悉归竹垞，就曾感叹其身世，“峰泖才人栖旅馆，参苓寿世浑无算。晚戴黄冠名利淡，犹余憾童乌早逝。堪兴叹，笛响山阳惊露电，薰炉茗椀空留案，身后文章谁校勘。嗟零乱，图书千卷归王粲”。^②借助赠书之举，得以在士人之间私下传唱，这大致可代表李延昆生前周遭友人士大夫对他身份的认识。

清高宗乾隆四十一年(1776)颁布《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一大批忠臣义士开始平反表彰。明末几社领袖陈子龙，顺治四年仍在坚持抗清斗争，被清军逮捕后，不屈投水而亡。尽管在当时的文坛享有盛誉，但其著作长期被清王朝禁毁，颇多散佚。《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表彰陈子龙“学问淹通，猷为练达，贞心可谅，大节无亏，今谥忠裕”，^③为陈子龙等一批明朝旧臣“平反”，其著作才被开禁。盖李延昆曾参与反清活动，并曾在南明永历朝为官，失败后，才北返江浙一带。由此一段经历，李延昆北返后一直处于半隐居状态，曾多次改名、改字、改号，隐姓埋名，以避清廷追查。故李氏生平经历犹如冥鸿绝影、入云之龙，行踪隐约难觅。诸书对其生年的记载出现错讹，也就不难理解了。^④

徐鼐(1810 ~ 1862)于道光三十年(1850)入清朝史馆，着手研究南明史，于咸丰十一年(1861)写成《小腆纪年(附考)》，同时作有纪传体的《小腆纪传》，两书并行。该书起自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终于康熙二十一年(1683)，以编年体记载其间四十年史事，使这段时期的重要事件和人物行动公诸于世。徐鼐将李延昆归为“遗臣”类，明确其在南明永历帝为官

^① ①嘉庆《南翔镇志》卷7《艺术》。(清)张承先著《槎溪志》，成于乾隆壬寅(1782)。嘉庆丙寅(1806)程攸熙增订，易名为《南翔镇志》。

②嘉庆《上海县志》卷15《艺术》。同治《上海县志札言记》卷5，也称李延昆曾“师事同郡举人徐孚远，为高第弟子，学从孚远入浙、闽。乃走桂林，任唐王某官。”

③嘉庆《松江府志》卷56《李延昆传》。

④王文景：《明代的儒医》，(台湾)《通识教育年刊》2002年第4期。

⑤“以李子之才，上而用之，则国之事必决之矣；下而求之，则山林之间，竹栢之下，其必有以容之矣，而李子独于医勤勤焉。为之著书，为之驰走，其好为生人而为之耶，抑自寓耶。虽然李子无自小，班孟坚曰，方技者，王官之一守也。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今也何如？李子将以论医者论国乎，将以论国者论医乎，吾于医宗求之矣。”宋征舆：《林屋文稿》卷2《李士材医宗序·代夏瑗公先生》，清康熙九籀楼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5册。

⑥王士禛：《池北偶谈》卷8《傅山父子》，《四库全书》第87册；全祖望：《鲒埼亭集》卷26《阳曲傅先生事略》，清嘉庆九年史梦蛟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29册。

⑦清平湖沈季友曾作长诗赠与李延昆《四叠韵别李辰山》：“志士不厌生业微，泥伏何必输云飞。夷齐采薇既疗饿，曲逆亦食糠覈肥。众人碌碌事口腹，得固穷困良亦稀。吾交同志有数辈，立节只在轻寒饥。卖丝濮老隐吴市，斫棺萧氏栖靡。亦有汪生事裁制，结楹天马林烟霏。猿腾鹿窜遂我性，束缚不受三驱围。先生高谊独迥出，友彼啮缺师蒲衣。吾行何为忽改辙，去去鞶鞶纡尘鞿。伤心白头入宾幕，何日岩前同所归。”沈季友：《樵李诗系》卷27《四叠韵别李辰山》，《四库全书》第1475册。

的经历，“年二十，走桂林，为永历帝某官，晚为道士，隐于医”，^⑥将他回归为一个遗臣的形象。

晚清浙江海宁人陈其元，曾受江苏巡抚丁日昌的青睐，先后代理南汇、青浦、上海几个大县的县令。在做南汇县令时，时有莲生赋诗一首，曾一度寻访李延昆之墓，以图兴复。

《放鹞亭怀李辰山先生》云：^⑦

坤宁宫中惊战鼓，衔香金鹤没败堵。^⑧危亭日落叫鹞鹞，尚占官家乾淨土。

李郎矫矫人中龙，只手直欲擎苍穹。请纓年少苦无路，恨煞冠佩假伶工。

福藩庸懦天夺魄，半壁东南轻一掷。静江重建小朝廷，桂王继起真雄特。

荷戈万里迈终童，献策惊倒瞿文忠。飞书走檄愈头风，印悬肘后磨青铜。

是时诸臣同戮力，天堑长江重开辟。毁家纾难脱钗环，况有英雄出巾幗。^⑨

朱丝挂颈悲烈皇，可惜不系西平王。蛮邦手缚真龙种，犹是人阨非天亡。

归来高隐茅亭宿，闲放白鹞非行乐。感愤时弹皋羽琴，忧来惟向西台哭。

我朝硕学重鸿词，遗老联翩趋丹墀。雄飞不羨冲霄鹤，雌伏甘为断尾鸡。

⁷ ①沈季友：《樵李诗系》卷29《放鹞道者李延昆》，《四库全书》第1475册。

②汪文柏：《柯庭余习》卷12《渔家傲·悼李辰山》，清康熙刻本，《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21册。汪文柏，字季青，一字柯庭，桐乡人。官北城兵马司正指挥。有《柯庭余习》、《古香楼吟稿》（阮元：《两浙輶轩录》卷7《汪文柏》，清嘉庆仁和朱氏碧溪草堂钱塘陈氏种榆馆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863册）。汪文柏藏书颇丰，自作《古香楼》云：“何物满高楼？宋鏤与秘录。青藜最可人，黄妳吾所欲。香清凝座隅，色古悦心目。焉敢傲百城，拥书聊自足”（《柯庭余习》卷15）。

③《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卷1，《四库全书》第456册。

④汪剑、和中浚：《明末清初医家李延昆及〈脉诀汇辨〉考》，《中医药文化》2012年第3期。

⑤徐鼐：《小腆纪传》卷56《遗臣一》，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遗逸类》第69册，台北：明文书局，1986年，第609页。

⑥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9《南汇李高士》，附莲生《放鹞亭怀李辰山先生》，清同治十三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142册。

⑦此诗原注：宣德年铸香金鹤以定时刻，见宣德鼎彝铭。

⑧此诗原注：桂林战守三月，援兵索饷而哗，瞿文忠夫人邵氏捐簪珥助之。

明知仙佛皆如梦，被体黄縵示无用。香积厨充羲士薇，何曾迷入桃源洞。

家亡国破剩闲身，埋骨东湖塔尚存。藏书奚必傅娇女，遗稿还同付故人。

我来吊古寻陈迹，荒亭尽圯堆瓦砾。长堤衰柳乌呼风，愁煞芦花头雪白。

君不见，投荒穷老沈太仆，吟魂飞堕澎湖曲。^①

又不见，遗民尚有叶与熊，^②弃家削发空王宫，销声匿影将毋同？

此笔倒是李延昱一生完整的写照，把他回归为一个壮志未酬的遗民，“家亡国破剩闲身”，令人作怅惘之叹。尽管不过是“销声匿影”、一抔空土埋孤魂，然而一个儒者的济世情怀却久久回荡。他一生心系家国山河，善抚琴、精于医、长于文，性情高洁，风骨萧萧，为学者所钦佩。晚清胡澐曾有《三君咏》：“不见李高士，琳宫锁暮霞。芸香消蠹简，炉火冷丹砂。寂寞闲云态，凄凉宿草嗟。他年华表鹤，归去已无家。”^③晚清时有关明清易代的话题已解冻，至此可以给李延昱一个完整的释读。

类似李延昱，绝非个体，这实是大时代背景下一个小人物的抉择，唯恐重蹈前人覆辙，“不幸以医见知，不及为文学近臣，终老异途，可慨也！”^④无论是李延昱身前的刻意安排，还是朱彝尊的有意叙述，后人大致可以少了如此的感叹，这可能也是李延昱所希冀的。

四、结语

明清易代，转眼繁华成眼云。对于不愿加入新政权的遗民而言，怎样才能不让自己被边缘化，仍然回归主流？那些被视为边缘人的群体，他们是否因为被边缘化，而完全在历史上没有声音？长期以来，李延昱是被作为一名医者，被医学界所认可。然而他本人的《南吴旧话录》、《放鹞亭稿》等著作又为我们展现了一位儒者的济世情怀。“医”与“士”看似互不搭界，这实际上与他游走于医与士之间有相当大的关联。

晚明士人活跃在现实世界中，他们相当自觉地在社会中自我标榜、相互标榜，由此发展出一套自我认同与辨识其社会身份的方式，能为士人提供一个可以营求个人声名、确认个人社会价值的途径，他们在心态或行为上都极具社会性与现实感。而清初，在异族统治下遗民失去了原有的表现舞台，不得以另寻出路，以至于隐姓埋名，与现实社会颇为疏离，成为社会上的边缘

^① ①此诗原注：鄞沈太仆光文，以遗民终老台湾。

^② ②此诗原注：兵部侍郎叶廷秀与吏科都给事中熊开元，均为僧以终。

^③ ③胡澐：《三君咏·李高士延昱》，载阮元：《两浙輶轩录补遗》卷2，清嘉庆仁和朱氏碧溪草堂钱塘陈氏种榆仙馆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684册。

^④ ④“太医院御医赵友同，字彦如，大臣荐其文学，时文皇帝方修《永乐大典》，用为副总裁。后修五经、四书、性理诸大全，又用为纂修官。其职实词林妙选，而衔仍方技杂流也。始彦如为宋景濂弟子，初用胡祭酒荐，拜华亭训导，曾主浙江乡试，满九载当升，以少师姚广孝言其知医，遂得此官，因而留京师充纂修。又有荐其知水利者，命从户部尚书夏元吉治水江南，其人之多才技可知矣。不幸以医见知，不及为文学近臣，终老异途，可慨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6页。

群体。虽然在精神意识上与明末士人群体相呼应，仍然延续了明代的诗酒唱和，但是依托的场景已然发生变化。李延昱生前以道士自居，将藏书赠与著名学者朱彝尊，临终以一瓢一笠一琴一砚分赠友人，逝世时用佛屠之法安葬，运用一系列具有文化身份象征的安排，借此营造出独特的生命意义。书籍成为士人自我表现的凭借由来已久，尤其是明代出版印刷业的繁盛，家有藏书，建藏书楼，更是风雅能文之士身份的一种标志，以获得社会肯定、尊崇。通过藏书、赠书的举动也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人际互动与交往网络，构成一个特别的社会情境。从李延昱的角度来说，他努力维系与文人圈子的交往，仍是希望保持其“士君子身份”的现实考虑。传统社会的主流仍是儒家读书人的行列，而不是技艺类的医者。而借由朱彝尊的声望与交往网络，使后世的士人们一直关注他、铭记他。

明清鼎革，士人无法通过直接参与新政权实现社会理想，只好凭借内在的精神修养和相对独立的文化传统完成其自身价值，以规避权力的紊乱和遮蔽。士人运用一系列文化象征符号，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寄托于超越个体生命的传统文化表征中，达到情感表达、生命自足的状态，以作为人们回顾这段改朝换代的历史记忆。这种无论是出于本人自身的选择，还是叙述者有意造成的模糊，实际上反映出易代时士人的一种困惑，以及泛边缘化的心态，同时又想回归主流的愿望。